

莫高窟第 254 窟五佛、 白衣佛和八佛题材考辨 *

陈菊霞 马丹阳

内容提要 依据莫高窟第 254 窟千佛题名的最新校录与研究成果，我们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对该窟中心柱的五佛、西壁的白衣佛和南北壁的八佛组合题材作了进一步的考辨，认为中心柱五佛是现在贤劫千佛之前五佛，即贤劫四佛 + 弥勒佛；白衣佛是现在贤劫千佛的“代言人”；八佛是过去七佛 + 弥勒佛的组合造像。

关键词 第 254 窟 五佛 白衣佛 八佛

敦煌第254窟位于莫高窟南区中段二层，始建于北魏，隋时重修甬道，其主室的绘塑作品基本保持了北魏的原作^①。第254窟是敦煌石窟中的精品洞窟，不仅窟内的本生和佛传故事画有名，而且四壁千佛因留存题名而倍显珍贵。本文拟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试对第254窟中心柱五佛、西壁的白衣佛和南北壁的八佛组合题材作进一步的辨析和考证。

一 中心柱五佛之定名

第254窟的窟形为中心塔柱式，即主室中后部凿出连通窟顶与地面的方形中心柱，这也是敦煌北朝时期流行的洞窟形制。中心柱分塔座和塔身二部分，塔身四面均开龕，其东向面(正面)开一圆券形大龕，内塑着半披肩袈裟交脚佛一尊。其余三面均上下开双层龕，其南北向面的上层均为阙形龕，内塑交脚弥勒菩萨像^②；下层为圆券龕，内塑禅定佛。西向面的上层为双树龕，下层为圆券龕，各塑一禅定佛。这样，第254窟中心柱龕像就形成了一身交脚佛、四身禅定佛和二身交脚弥勒菩萨的结构布局形式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唐宋敦煌石窟图像与洞窟宗教功能研究”(项目编号: 19BZJ015)和“上海市‘海洋考古与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及传播’重点创新团队”阶段性成果。

① 关于窟内具体内容及造窟年代的判定，参见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01—102页；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9—372页。

② 将第254窟中心柱上层龕中的交脚菩萨定为弥勒菩萨的学术成果主要有：贺世哲《莫高窟北朝五佛造像试释》，《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第123页；张元林《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二五四窟附第二六〇窟(北魏)》，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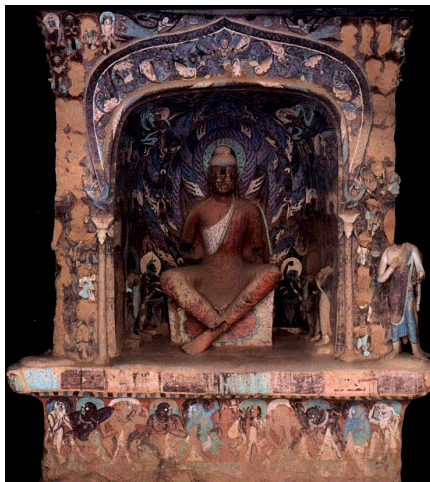
〔图一〕⁴¹。

关于东向龕内交脚佛之定名，学界形成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两种看法。

1、释迦佛说。这一判定主要是依据中心柱东向龕内西壁佛座两侧的外道形象而得出。学者们将南侧手执鸟的外道推定为婆薮仙，将北侧的外道推定为鹿头梵志²。贺世哲先生认为婆薮仙与鹿头梵志这两个人物与释迦牟尼佛有密切关系，前者是释迦牟尼佛的护法神之一，后者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之一，故将主尊定为释迦佛³。日本学者阿部贤次说：“根据佛像两侧的胁侍可考证254窟的主尊是释迦牟尼。主尊两侧的故事画，两幅为佛传，两幅为本生。这也可以说明254窟的主尊是释迦牟尼。”⁴陈慧宏依据北朝早期中心柱佛像的配置关系也将254窟中心柱的交脚佛判定为释迦牟尼⁵。

〔图一〕莫高窟第254窟中心柱四向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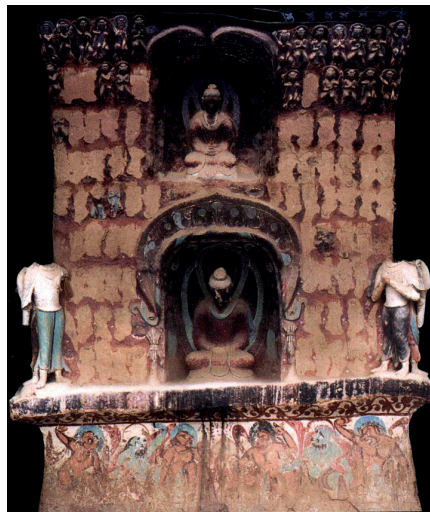
采自陈海涛、陈琦《图说敦煌二五四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94—19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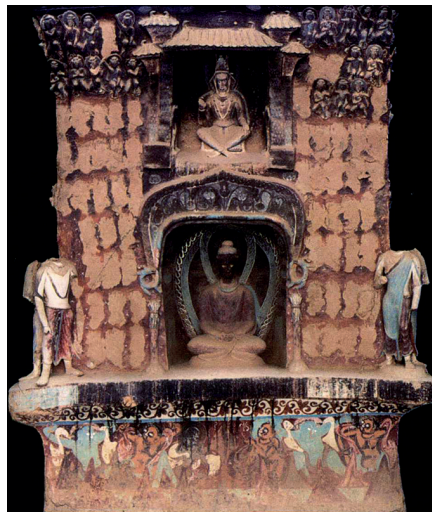
东



南



西



北

〈1〉 取自陈海涛、陈琦《图说敦煌二五四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94—195页。

〈2〉 [日]松本荣一《敦煌画の研究》，东方文化研究所，1937年，第757页；柳村《观莫高窟说法龕——彩塑、壁画反映的哲学上的斗争》，《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第111页；前揭贺世哲《莫高窟北朝五佛造像试释》，第122页；谢生保《试论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婆薮仙人和鹿头梵志》，敦煌研究院编《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卷》，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04页；贺世哲《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1—111页。

〈3〉 前揭贺世哲《莫高窟北朝五佛造像试释》，第122页；贺世哲《关于敦煌莫高窟的三世佛与三佛造像》，《敦煌研究》1994年第2期，第69页。

〈4〉 [日]阿部贤次《莫高窟第254窟的艺术和佛教实践活动》，载《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艺术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163页。

〈5〉 陈慧宏《敦煌莫高窟早期的千佛图》，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94年，第121页。

2、弥勒佛说。关于第254窟中心柱东向龕内手执鸟的外道形象，王惠民先生后来又提出了新观点，认为不是婆薮仙，而是尼乾子¹。我们认同这一看法。此前王惠民还强调：“它们(婆薮仙和鹿头梵志)与主尊塑像的关系，是笼统地表示佛教征服外道，而非释迦牟尼的眷属。主尊塑像有的是倚坐佛，有的是结跏趺坐佛，恐不能完全依据婆薮仙、鹿头梵志来确定其身份。”²其实，在贺世哲先生讨论婆薮仙和鹿头梵志这一组合造像之前，敦煌研究院的一些学者已将第254窟中心柱的交脚佛定为弥勒，相关成果有《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二五四窟附第二六〇窟(北魏)》《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一卷等³。张元林后来又在《莫高窟北朝窟中的婆薮仙和鹿头梵志形象再识》一文中再次强调了关于弥勒佛的看法⁴。

学者们除了研判第254窟中心柱东向龕内的主尊身份外，还将其与另外三向面的四身禅定佛作为组合造像来研究。如《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作者认为莫高窟北朝洞窟“中心柱四面龕内造像似乎与释迦‘出家’‘苦修’‘成道’‘说法’各相有关，这符合禅观所要求的观佛传各相”⁵。贺世哲先生讨论了莫高窟第251、254、257、260、437、435等窟中心塔柱龕内的五佛造像，认为是释迦如来五分法身像，即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知见身⁶。或许以上观点可以解释莫高窟北朝个别洞窟中的中心柱四面龕内的造像组合，但我们却认为不适合解读第254窟中心柱的组合造像。

近来，我们利用一些新获资料对第254窟的千佛题名又作了进一步的校录，并撰写论文《莫高窟第254窟千佛题名释录与研究》⁷。通过此次的补充校录，我们发现第254窟的千佛题名存在一定的分布规律，可细分为十个区域。

东壁：以门窗为中线，将北侧的千佛图像划为东一区，将南侧的划为东二区。

西壁：以下方中部的白衣佛为中线，大体将其北侧的千佛图像划为西一区，南侧的划为西二区。

南北壁：将两壁人字披下交脚菩萨龕东侧的千佛图像分别划为南一区 and 北一区；将其西侧的分别划为南二区和北二区；将两壁西侧佛龕下的千佛图像分别划为南三区 and 北三区。

我们将这十区的千佛题名与藏经中的千佛名经作了仔细比对，发现宁强和胡同庆的判定是正确

〈1〉 王惠民《执雀外道非婆薮仙辨》，《敦煌研究》2010年第1期，第4页。

〈2〉 王惠民《婆薮仙与鹿头梵志》，《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第70页。

〈3〉 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第371页；前揭张元林《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二五四窟附第二六〇窟(北魏)》，第11页；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92页。

〈4〉 张元林《莫高窟北朝窟中的婆薮仙和鹿头梵志形象再识》，《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第75页。

〈5〉 前揭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第370页。

〈6〉 前揭贺世哲《莫高窟北朝五佛造像试释》，第117—124页。

〈7〉 该文对第254窟的千佛题名作了进一步的校录，并讨论了第254窟千佛题名的抄写规律和其依据的佛经等问题。后续请参见陈菊霞、樊锦诗、柴勃隆、马丹阳《莫高窟第254窟千佛题名释录与研究》，待刊。

的，第254窟千佛题名与“阙译本”佛名经有着同源关系¹。我们找到了与第254窟千佛题名最相近的“阙译本”，发现第254窟过去庄严劫佛名与《房山石刻藏》中的“阙译本”《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最相近，而其未来星宿劫佛名与《高丽初雕藏》中的“阙译本”《未来星宿劫千佛名经》最相近²。现将第254窟的千佛题名与“阙译本”《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和《未来星宿劫千佛名经》的对应关系列表如下[表一]：

[表一] 第254窟十区千佛题名分布位置示意

区划	东二区	南一区	南二区	南三区	西二区
题名出处	未来星宿劫千佛	未来星宿劫千佛	过去庄严劫千佛	过去庄严劫千佛	过去庄严劫千佛
南部区域←←←←←←←← 中心柱 北部区域→→→→→→→→					
区划	东一区	北一区	北二区	北三区	西一区
题名出处	过去庄严劫千佛	过去庄严劫千佛	过去庄严劫千佛	未来星宿劫千佛	未来星宿劫千佛

[表一]十区的佛名分布说明，第254窟以西壁白衣佛和东壁门窗所在的中轴线将千佛分为南北两大区域：北部区域，从东一区至西一区是大体按照过去→过去→过去→未来→未来规律题写；而南部区域，从西二区至东二区也是大体按照过去→过去→过去→未来→未来的规律题写。由此，从空间上，形成了从东壁门北→北壁→西壁北侧，再从西壁南侧→南壁→东壁门南这样一个逆时针方向的闭合³。

这样的对称布局绝不是偶然现象，相反，它意在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中轴线上的中心柱，去寻找缺失的现在贤劫千佛。

关于第254窟缺失现在贤劫千佛这一现象，贺世哲先生认为可能是以塑像、壁画相结合的形式表现三世三千佛⁴。陈海涛和陈琦认为整窟通过绘塑联壁，使其中轴线具有现在贤劫的时间意味⁵。而陈慧宏亦认为254窟的中心柱表现了现在和未来的时间观⁶。鉴于以上看法，我们认为第254窟中心柱南北西三面四龕中的禅定佛当表现贤劫四佛，即拘那提佛(又译为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东向龕内的交脚佛为弥勒佛。这样，由贤劫四佛和弥勒佛组成的五佛正是“阙译本”《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的前五佛。

至于贤劫四佛的具体分布，因缺乏题名而不能定断，但从信众右绕礼佛的习俗来看，中心柱南向面下层龕中的禅定佛当为拘那提佛，西向面上下龕内的禅定佛分别是拘那含牟尼佛和迦叶佛，北向面下层

1、宁强、胡同庆《敦煌莫高窟第254窟千佛画研究》，《敦煌研究》1986年第4期，第28页。
 2、前揭陈菊霞、樊锦诗、柴绍隆、马丹阳《莫高窟第254窟千佛题名释录与研究》，待刊。
 3、就第254窟十区千佛图像的划分而言，南北壁各区界线较清晰，而东壁和西壁却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如东壁，其门南和门北最下方三行都题写过去佛，之上各行才以门窗为中线，门北抄过去佛，门南抄未来佛。再如西壁，基本都以下方中部的白衣佛为中线，分北侧抄未来佛，南侧抄过去佛，但最上方一行的未来佛远超中线。
 4、贺世哲《关于北朝石窟千佛图像诸问题》，《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第5页。
 5、前揭陈海涛、陈琦《图说敦煌二五四窟》，第196页。
 6、前揭陈慧宏《敦煌莫高窟早期的千佛图》，第121页。

〔图二〕莫高窟第254窟白衣佛
采自前掲陈海涛、陈琦《图说敦煌二五四窟》，第202页



龕内的禅定佛为释迦牟尼佛。这样，当僧尼和信众右绕礼佛时就会礼观以贤劫四佛和弥勒佛为代表的现在贤劫千佛。

二 西壁白衣佛之定名

第254窟西壁上方绘天宫伎乐，下方绘药叉，在这二者之间的壁面几乎满绘千佛，唯独在千佛中央下方绘制一圆券龕，龕内绘一身持说法印的白衣佛〔图二〕^{〔1〕}，两侧各侍立一菩萨。这样的布局又见于莫高窟北魏263窟和西魏288、431、435窟。

关于这5铺白衣佛图像，学界曾展开过热烈讨论，就其定名主要形成卢舍那佛、弥勒佛和释迦佛三种看法。第一，卢舍那佛说。美国学者约翰·亨廷顿(John Huntington)推测敦煌北朝洞窟中的白衣佛来源于犍陀罗，并将其定名为卢舍那佛，但没有展开详细讨论^{〔2〕}。第二，弥勒佛说。王惠民先生认为这5身白衣佛是弥勒的一种瑞像，它的出现与末法思想有关^{〔3〕}。第三，释迦说。谢生保推测白衣佛可能是摩腾、法兰二位印度高僧最初带到中国的白氈释迦像的画样^{〔4〕}。赖鹏举阐释了白衣佛与涅槃的关系，认为以中国丧服颜色的“白衣佛”来代表“涅槃”^{〔5〕}。高歌亦认为白色袈裟的佛像具有释迦牟尼佛涅槃的象征意义^{〔6〕}。滨田瑞美认为白衣佛是《观佛三昧海经》等佛教典籍中所记述的“那乾诃罗的佛影”^{〔7〕}。贺世哲先生认同滨田瑞美的观点，认为由释迦佛踊入石壁变现出来的白色佛影，实际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8〕}。谢漠兮认为五铺白衣佛是犍陀罗风格的释迦瑞像图^{〔9〕}。龙忠认为白衣佛是处于末法时期的释迦牟尼佛瑞像^{〔10〕}。

其实，除了以上三种观点外，陈慧宏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看法，她认为莫高窟

〔1〕 前掲陈海涛、陈琦《图说敦煌二五四窟》，第202页。

〔2〕 John Huntington, "The Iconography and Iconology of Maitreya Images in Gandhara," in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vol. VII:1, (July 1984), pp. 133-179.

〔3〕 王惠民《白衣佛小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第66—69页。

〔4〕 谢生保、凌云《敦煌艺术之最》，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222页。

〔5〕 赖鹏举《丝路佛教的图像与禅法》，圆光佛学研究所，2002年，第218—222页。

〔6〕 高歌《白袈之光之涅槃象征——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白衣佛形象的艺术解析》，《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91页。

〔7〕 [日]滨田瑞美《关于敦煌莫高窟的白衣佛》，《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第11页。

〔8〕 前掲贺世哲《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第88—95页。

〔9〕 谢漠兮《敦煌石窟北朝白衣佛小考》，中国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66页。

〔10〕 龙忠《敦煌石窟壁画白衣佛像图像探析》，《法音》2019年第8期，第58页。

的5铺白衣佛说法图是贤劫千佛中佛法付嘱的象征，不是特定专指哪一尊佛¹¹。这一看法似乎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和共鸣，但如果结合第254窟的千佛题名和千佛图像的布局来看，我们认为她提出的这一看法是最有说服力的。我们先来看她引证的关键史料——《法苑珠林·法服篇》，其文云¹²：

尔时世尊又告大众：我初成道时，欲入河洗。尔时河神现身，手执此宝塔，内有黄金函，盛一安陀会，并一尼师坛，及有一钵袋。迦叶佛四牙并在函中。此是迦叶佛付我，令付世尊。今澡浴竟，请披安陀会。我即受著，地为六种震动。而安陀会四角放光，照千百亿国土。十方诸梵王寻光来至我所，前白我言：此白氎五条是拘留孙佛衣。佛涅槃已，展转相付，及至楼至佛。释迦佛涅槃后，付嘱娑竭龙王，令依此法衣造八万领，仍造塔供养，镇后遗法。而此安陀会四角及条节头，皆安卍字。此衣贤劫中最初而造。而此宝塔形同五寸，而世尊开塔现真珠楼观，其数八万，盛拘留孙佛所说遗教。又有彼佛三比丘坐禅。佛命文殊：汝吹我法螺，至彼比丘所，吹兴出世曲。文殊依命吹螺。入定比丘即起问文殊师利：今有何佛出世？文殊答言：此贤劫中第四释迦佛出世。彼三比丘俱来礼佛，在一面住。即白佛言：拘留孙佛般涅槃时，付我安陀会、尼师坛及钵袋，令我住此塔中。乃至楼至佛，令我始入涅槃。迦叶佛又付我四牙。牟尼佛施我少爪发，并置塔中。世尊涅槃后，从塔中出，于此阎浮提乃至大千界，处处流布衣塔，镇后遗法也。

引文中的“牟尼佛”指拘那含牟尼佛。这段引文意在说明现在贤劫千佛的付嘱传法圣物，有安陀会、尼师坛、钵袋等，其中安陀会又被称作“白氎五条”，是现在贤劫千佛之首佛拘留孙佛的佛衣。拘留孙佛将他的白色安陀会、尼师坛、钵袋等圣物传给拘那含牟尼佛。之后，遵照付嘱，又依次传给迦叶佛、释迦牟尼佛……，直至贤劫最后一佛楼至佛。陈慧宏据此认为白衣传递表明贤劫千佛的“世系”，是贤劫千佛中佛法付嘱传承的象征¹³。笔者认为她将现在贤劫千佛的传法圣物白色安陀会与白衣佛之“白衣”联系起来是非常睿智的。由此来看，第254窟西壁的白衣佛确实不是专指某一佛，而是作为现在贤劫千佛的代表或“代言人”出现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顺理成章地解释白衣佛与千佛的组合关系：

第一，就第254窟西壁而言，作为现在贤劫千佛代表的白衣佛，与其南侧的过去庄严劫千佛和北侧的未来星宿劫千佛构建了一重的三世三劫思想。

第二，白衣佛还与南北壁西侧的千佛发生互动关系。我们注意到，南北两壁西侧佛龕下方的千佛图像中各绘制一铺构图和造型几乎相同的说法图，居中是一身结跏趺坐的说法佛，左右各侍立一身菩萨，上方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前文已提及，南壁和北壁西侧的这二区千佛题名分别是过去庄严劫千佛和未来星宿劫千佛，那么，这二铺说法图的主尊无疑是过去庄严劫千佛和未来星宿劫千佛各自的“发言人”。如

11 前揭陈慧宏《敦煌莫高窟早期的千佛图》，第131—136页。

12 (东晋)释道安，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卷三五《法服篇》，中华书局，2003年，第1116页。

13 前揭陈慧宏《敦煌莫高窟早期的千佛图》，第136页。

〔图三〕莫高窟第254窟南壁后部四龕像

采自前揭陈海涛、陈琦《图说敦煌二五四窟》，第204-205页



〔图四〕莫高窟第254窟北壁后部四龕像

采自白文《万物“不迁”之维——敦煌莫高窟第254窟图像结构主题再讨论》，《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第11页



此，当僧尼和信众绕塔礼佛时，他们会依次礼敬过去庄严劫千佛及其“发言人”、现在贤劫千佛的“发言人”（即白衣佛）和未来星宿劫千佛及其“发言人”，由此感悟三世三劫千佛的永续传承。

三 南北壁八佛之定名

第254窟南北两壁西侧上方各对称开凿有并列的4个圆券形龕〔图三，图四〕，每龕塑一佛和二胁侍菩萨。佛像或结跏趺坐说法，或禅定，并以二佛为一组交叉排列；这八尊佛像和十六身胁侍菩萨多有损毁，除北壁二身禅定佛的头部完整外，其余佛头竟毁；持说法印的四身佛像的双手也多被砍掉；十六身胁侍菩萨大多损毁殆尽。

关于这八身佛像，贺世哲先生和张元林认为是表现释迦牟尼佛的，但都没有展开说明^{〔1〕}。我们认为，对于供僧尼和信众绕塔礼佛的第254窟中心柱甬道而言，既然其外侧千佛题材遵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千佛顺序而绘制，那么，位处同一旋绕顺序的南北壁上方的八佛按理也当处于三世序列中，由此，

〔1〕 前揭贺世哲《关于北朝石窟千佛图像诸问题》，前揭张元林《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二五四窟附第二六〇窟（北魏）》，第11页。

这八佛应该是与三世思想有密切关联的“过去七佛+弥勒佛”的组合造像。

我们先来看阐述“过去七佛”与“弥勒”关系的经文。如《增一阿含经·十不善品》云¹：

佛告阿难，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名毗婆尸如来……复于三十一劫中，有佛名试诘如来……于彼劫中，复有佛出现世间，名毗舍罗婆……于此贤劫中，有佛出世，名曰拘楼孙如来……于此贤劫中有佛出世，名曰拘那含牟尼如来……于此贤劫有佛，名为迦叶……我（释迦牟尼）今如来出现于世……将来久远，弥勒出现，至真等正觉，欲闻其变。

上引经文记述了先后出世的毗婆尸佛、试诘佛、毗舍罗婆佛、拘楼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以及将来出世的弥勒佛。其中，前三佛出现于过去劫，后四佛出现于贤劫，弥勒则在“将来久远”出现。显然，上引经文意在表达七佛与弥勒构建的三世思想。

关于弥勒佛之前的七佛，又见于《长阿含经·大本经》《佛说七佛经》《七佛父母姓字经》等很多佛典，不过，这些佛典关于七佛的译名略有差异，如《长阿含经》卷一写作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罗婆佛、拘楼孙佛、拘那含佛、迦叶佛和释迦牟尼佛；《七佛父母姓字经》译作维卫佛、式佛、随叶佛、拘楼秦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和释迦牟尼佛。等等。

鉴于释迦牟尼佛已经涅槃，元魏菩提流支翻译的《佛说佛名经》等佛典将上述七佛统称为“过去七佛”。霍旭初先生说：“尊奉过去七佛，实际就是对佛教久世传承，法脉一贯的认同与遵循。”²又因毗婆尸佛时的人寿为“八万四千岁”，而弥勒佛时的人寿也是“八万四千岁”，所以宫治昭先生认为这暗示了弥勒佛出世时的人寿将会回复到最初毗婆尸佛时的人寿，这样构建的一个循环体现了过去七佛与弥勒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³。而《佛说弥勒下生经》则明确将“过去七佛”和弥勒佛视为“未来过去现在三世”⁴。另外，隋代吉藏的《观无量寿经义疏》也将过去七佛与弥勒佛称作“竖三世佛”，其文云：“言《弥勒经》三世竖化者，过去七佛（应为六佛）、现在释迦、未来弥勒。明三佛化，故是竖化也。”⁵显然，“过去七佛”和弥勒构成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的信仰体系，意在证明佛法传承的一贯性与合理性。

随着三世佛思想的成熟和三世信仰的盛行，在犍陀罗地区兴起了“七佛一菩萨”，即过去七佛和一弥勒菩萨的组合造像。就其造型来看，基本都是按“一”字型排列，其中的弥勒菩萨，或位于最左端，或位处最右端，赋予整个组合造像以方向性。

关于犍陀罗“七佛一菩萨”的造像资料，日本学者栗田功、宫治昭，法国学者阿·福歇等都有数量不

1、（东晋）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卷四四《十不善品》，《大正藏》第2册，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年，第786—787页。

2、霍旭初《龟兹石窟“过去佛”研究》，《敦煌研究》2012年第5期，第29页。

3、[日]宫治昭著，李萍、张清涛译《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36页。

4、（西晋）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经》，《大正藏》第14册，第421页。

5、（隋）吉藏《观无量寿经义疏》，《大正藏》第37册，第236页。

等的收录和介绍¹。而对于“七佛一弥勒”造像背后所关涉的信仰，学者们也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赵玲认为，“过去七佛和弥勒菩萨的制作，表明当时三世佛信仰的形成，也是弥勒信仰的开始”²。孙英刚、何平认为，“弥勒信仰兴起后，在犍陀罗地区跟七佛信仰相结合，发展出了七佛一弥勒的构图”³。赖鹏举指出多件菩萨与过去六佛或七佛合造在一起是受犍陀罗地区兴起的“菩萨”思想有关。“过去七佛是明确地表达过去七尊出世的佛陀，前尊佛与后尊佛间传承的关系，其最后一尊释迦佛之后接上了现在的弥勒菩萨，表示此菩萨是释迦佛未来唯一的继承者”⁴。

犍陀罗所形成的“七佛一菩萨”的造像样式又经丝绸之路东传，对我国早期佛教艺术产生深远影响⁵。如发现于我国西部，主要是甘肃河西走廊的武威、酒泉、敦煌和新疆吐鲁番等地的14座北凉石塔，它们的造型、雕刻内容和细部装饰都基本相同，均在覆钵形塔肩或塔腹上浮雕或线刻“七佛一弥勒”之造像⁶。

就北凉石塔上的“七佛一弥勒”造像而言，其弥勒多为菩萨形象，但唯一留存弥勒题记的敦煌□吉德塔却将菩萨装弥勒立像写作“弥勒佛”。对于这一现象，殷光明解释说，（北凉石塔上的）“交脚菩萨像不是辟支佛，而是三世佛系列中的未来佛弥勒”⁷。另外，敦煌□吉德塔还残存了五则过去七佛之题名，分别为“第一维□□”“第二式佛”“第三随叶佛”“第四句留秦佛”“第七释迦牟尼□□”⁸。赖鹏举认为这七佛名号出自《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⁹。

在14座北凉石塔中，武威石塔则直接将弥勒雕为佛像。其圆锥形塔身分上、中、下三层，每层都雕有“七佛一弥勒”造像，其中弥勒分别为禅定像、交脚像与半跏思惟像。显然，上层已将弥勒雕造成了跏趺坐的禅定佛像¹⁰。

北凉石塔七佛与弥勒佛组成的“八佛”造像，后来又对北魏佛教造像产生了影响。殷光明举出了几个

〈1〉 [日]栗田功《ガンダーラ美術・Ⅱ・佛陀の世界》，二玄社，1990年，第107—109页；前揭[日]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第208页；[法]阿·福歇著，王平先等译《佛教艺术的早期阶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

〈2〉 赵玲《古印度佛像种类研究》，《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第2期，第91页。

〈3〉 孙英刚、何平《犍陀罗文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520页。

〈4〉 前揭赖鹏举《丝路佛教的图像与禅法》，第24—25页。

〈5〉 庞跃雷《北凉石塔七佛一弥勒造像考察》，《西北美术》2019年第3期，第126页。

〈6〉 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新竹：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2000年，第23、163页。

〈7〉 前揭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第167页。

〈8〉 前揭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第163页。

〈9〉 前揭赖鹏举《丝路佛教的图像与禅法》，第172页。

〈10〉 前揭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第24页。

造像例证¹。如：

其一，法国吉美博物馆所藏一座小型北魏石塔，分上、中、下三层，它的上中两层皆周开八龕，每龕内造一尊结跏趺坐佛²。其二，甘肃庆阳楼底村一窟(北魏)，其中心塔柱分两层，上层为八面形，每面各开一长方形龕，龕内各造一结跏趺坐佛及二胁侍菩萨³。其三，甘肃泾川北魏王母宫石窟，其中心塔柱分上下两层，上层呈八面形，每面龕内造一佛二菩萨像，佛均结跏趺坐⁴。

这种由七佛和弥勒佛组成的八佛造像思想，我们在《魏书·释老志》中也可窥见一斑，其文云⁵：

所谓佛者，本号释迦文者，译言“能仁”，谓德克道备，堪济万物也。释迦前有六佛，释迦继六佛而成道，处今贤劫。文言将来有弥勒佛，方继释迦而降世。

虽然上列引文也在强调由过去七佛和弥勒所构建的三世思想，但关于未来佛，更倾向于从兜率天宫降生于人间的“弥勒佛”。究其原因，当与十六国北朝时期弥勒下生思想的广泛流传有关。因为这一时期，战争频繁，百姓流离失所，生活极为困苦，他们迫切地需要弥勒下生拯救人间。据《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和《佛说弥勒大成佛经》等记载，弥勒下生成佛，不但度化百亿计的众人，而且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如此富庶、祥和的景象，怎能不令处在困境中的民众心驰神往呢。

由此，我们认为第254窟南北两壁西侧上方的八佛造像正是北凉和北魏时期所流行的过去七佛和弥勒佛的组合造像，意在强调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佛信仰。而八佛的排列顺序当遵循右绕原则，自南壁至北壁依次是过去庄严劫三佛、贤劫四佛和弥勒佛。另外，就八佛的造型来说，还可以与酒泉出土的北凉马德惠石塔和敦煌出土的北凉沙山石塔中的七佛一弥勒造像进行比较，这三处的过去七佛大体都是将持说法印和禅定印进行交叉排列。

综上所述，依据莫高窟第254窟千佛题名的最新释录与研究成果，我们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对该窟中心柱的五佛、西壁的白衣佛和南北壁的八佛组合题材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认为中心柱五佛是现在贤劫千佛之前五佛，即贤劫四佛+弥勒佛；白衣佛是现在贤劫千佛的“代言人”；八佛是过去七佛+弥勒佛的组合造像。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何 芳)

〈1〉 前掲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第248页。

〈2〉 东京都美术馆《シルクロード大美術展》，日本东京都美术馆，1996年，图209。

〈3〉 甘肃文物工作队《庆阳北石窟寺》，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版23—27。

〈4〉 张宝玺《甘肃泾川王母宫石窟调查报告》，《考古》1984年第7期，第622页。

〈5〉 (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3027页。